

《“东乡语词汇”蒙古书面语词索引》序言

[日] 栗林 均

1. 本索引是以蒙古语族的东乡语词汇集——《东乡语词汇》（布和等编，蒙古语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 008，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呼和浩特，1983 年，16+192 页）一书为底本，挑出书中的蒙古语族同源词，并以蒙古书面语作条目进行编排的。

《东乡语词汇》，是从 1982 年开始出版，是至今在继续出版发行的《蒙古语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中的第 8 分册（008）；是比 A5 型略小一点的长 200 毫米×宽 137 毫米开本；分为精装本和简装本两种。《词汇》的蒙文前言和凡例以及相同内容的汉文前言和凡例共 16 页，正文为 192 页。

本书的东乡语词是用国际音标标记，按照传统的蒙文字母表的顺序排列的。各词条下面用汉文注明其词类和词义，成为东乡语和汉语对照的词汇集。收词大约 4000 条。此外，注明了每个词的来源，这是本词汇集最大的特点。即在蒙古语族的单词上注了同源的蒙古语词（用蒙文标记）；在来源于汉语、维吾尔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和藏语的借词上分别用汉字、罗马字（应为维吾尔新文字——译者注）、阿拉伯文、藏文标写了原来语言的词形。

根据《词汇》前言所述，东乡语的实地调查是在 1980 年以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锁南坝公社为调查主点，以龙泉公社为调查副点进行的，是内蒙古大学蒙古语研究所讲师布和及研究生包力高、呼和巴日斯等参加这次调查工作的。

关于利用《词汇》时需要注意的具体事项在该书的凡例中作了说明。但本索引在标写蒙古书面语词目上有一个特点，在这里需说明一下。那就是，喀尔喀蒙古语、布利亚特语、卡尔梅克语、内蒙蒙古语等大多数现代蒙古语方言里已经消失，而在所谓 13—14 世纪“中世纪蒙古语”文献里都能遇见的词首的无声摩擦辅音 *h* 的问题。众所周知，在蒙古书面语里没有同它相应的专门的字母，全部当作以元音开头的词来标记的。但在本书里碰到东乡语中的相应的辅音时，在相应的蒙古书面语的词首也加上了辅音 *h*，并且把它们排列在 *h* 类词条里（当然这不会妨碍检索，因为还有列入以元音开头的词条）。

这样作的目的无非是为研究蒙古语言史上的上述辅音提供方便而已。在现代蒙古语族语言中保存同中世纪蒙古语词首辅音 *h* 对应的一些辅音的语言有：达斡尔语、东部裕固语、土族语、保安语以及现在接触的东乡语。但是，犹如在中世纪蒙古语的不同文献里或在同一个文献里在标写该辅音时出现异同现象那样，在上述这些语言之间相互对应的情况也是不完全一致的。在某个语言里保留着相应的词首辅音，而在另一些语言里却以元音开头的词与之相对应的例子也不少。

在本索引里，将东乡语词首带有相应辅音¹的单词都排列在“h”类的条目里。因此，列入此类的词目在上述其他语言和文献中也有不带词首辅音，而以元音开头的词来对应的情况。与此相反，在东乡语里以元音开头，因而未排列于“h”类条目中的词在其他语言和文献里也有带词首的相应辅音的情况。请将这些当做一种比较研究的资料来看待。

2. 东乡语是聚居在中国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区的东乡族人所讲的蒙古语族语言。

据《中国 1982 年人口普查资料》(北京、1985) 统计，东乡族人口有 279,523 人²。其中人口最为集中的是临夏回族自治区的东乡族自治县，这里居住的东乡族大约有 20 万人³。没有独自的文字，使用汉字，大部分人会讲汉语，也就是说会讲两种语言。东乡族以农业生产为主，兼营畜牧业。信仰伊斯兰教；风俗和文化方面与回族相同。

东乡这个民族和语言的名称是由曾经表示行政区划的“(河州)东乡”的汉语词得来的。也就是由东西南北四个乡组成的河州(卫)的“东部乡村(人)”的意思。由于信仰伊斯兰教，曾被称为东乡回回、蒙古回回等。此外，有“托毛”的名称，是对伊斯兰化了的蒙古人和西藏人的俗称，但其中的大部分可能是东乡族。曾经还有过这个民族和语言自称为“散塔”(Santa)的报道，但现在该语言里“散塔”表示“回族，伊斯兰教徒”的意思。现在民族的和语言的名称都叫做“东乡”。

又如，关于这个语言，N·鲍培在《阿尔泰语言学引论》(威斯巴登，1955)一书的第 9 页写道：

“散塔语使用于中国的甘肃省，更确切些说，Kaoho 高河(former Hochou 旧河州)市以东。使用者约 15 万人。有些作者称这个语言为东乡语，但这是不很确切的。”与其这么说，不如指出鲍培的阐述却是“不很确切的”。所以在这里更正一下。

首先，Hochou 是指“河州”，但是所谓 Kaoho 是 taoho 的误排，即“导河”正是现在的临夏市。我想这个说明是根据田清波(A·Mostaert)的《关于甘肃的蒙古人及其语言》(载《北京辅仁大学学报》1931 年第 8 卷)写的。民国时期，“河州”改名为“导河”，而重新改名为现名“临夏”是 1928 年的事。因此，这里应该是临夏。

其次，虽有散塔这个名称，但如上所述没有用它来表示民族和语言的自称。田清波在《在甘肃西部蒙古的土族方言，第二部分：语法》第二版(海牙，1964)里加的序言中回忆，他于 1919 年在鄂尔多斯南部的博如布日嘎苏遇见马鸿宾将军

¹ 即词首 h、f、x、c、s 等辅音—译者注。

² 应为 279,397 人。—编者。

³ 这个数字不准确。据《东乡族自治县概况》报道，全县东乡族人口为 137,442 人(1984 年统计)—译者注。

的军队的几名原籍为导河的伊斯兰教徒士兵时，他们自称是散塔人，称自己的语言为散塔语 (Santa Kele)。接着田清波看到参加 1955-1956 年中国国内蒙古语族语言和方言调查工作的托达叶娃女士和那森巴雅尔的报道之后，他写到：“专门调查过居住在临夏东部山区的蒙古语族居民及语言的两位学者都不称他们为‘散塔’，而称为‘东乡’。所以我想曾经叫做‘散塔’的名称，由于某些原因现在日常口语中似乎不使用了。”这大概是正确的推论吧。

如上所说，在东乡语里 *santa* (散塔) 只表示“回族，伊斯兰教徒”的意义。这个词的来源虽不清楚，但也有充分理由可以这样想：东乡人将对于异教徒称自己为“伊斯兰教徒”(即“散塔”)的这一名称曾当做民族的名称通用过。

3. 关于东乡语的研究历史是不长的。1884—1886 年间，在中国的青海、安多地区旅行的俄国探险家布塔宁在这个地区的三川、威远堡、保安、宋家村等地收集了词汇和短文。布塔宁为了区别于蒙古高原蒙古语、把它称做“西伦郭勒蒙古语”，并将这些材料连同从甘州(现在的张掖)南部的南山溪谷收集的西喇裕固语词汇一起收录于《中国的唐藏边区和中央蒙古地方》一书的第二卷(1893年)第七章《西伦郭勒方言及西喇裕固方言词汇集》里。布塔宁虽然路径东乡地区没有在那里逗留，但在兰州与河州之间由东乡地区迁来定居的上述宋家村收集了单词和短文。然而，直至本世纪中叶，布塔宁的《词汇集》所收录的不足 200 条单词便成为了解这个语言的所有材料。

通过 1955—1956 年进行的中国国内蒙古语族语言和方言调查，才弄清了东乡语的实际状况。此次调查已确认，在“西伦郭勒蒙古语”中除了包括已经比较明确了土族语之外，东乡语和保安语也是蒙古语族中的各自独立的语言。布塔宁记录的语言，就是现在所分类的下列语言和方言。

三川	:	土族语民和方言
威远堡	:	土族语互助方言
保安	:	保安语同仁方言
东乡	:	东乡语
西喇裕固	:	东部裕固语

1955—1956 年调查后，公开发表的有关东乡语的论著有如下：

B·H·托达叶娃：《论东乡语》(载于 *Acta Orientalia* IX, 1959, pp. 273-310)

Б·X·托达叶娃：《东乡语》，《中国的蒙古语和方言》，莫斯科，1960，pp. 88-107。

Б·X·托达叶娃：《东乡语》，莫斯科，1961。

那森巴雅尔：《东乡语札记》，载于《蒙古学研究的某些问题》，乌拉巴托市，1961，pp. 53-106。

刘照雄：《东乡语概况》，载于《中国语文》1965 年第 2 期，153-167 页。

刘照雄：《东乡语简志》(《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北京，1981)。

角道正佳:《东乡语的语音变化》载于《大阪外国语大学学报》第 59 号, 1982, 17-35 页。

还有, 在下述书中也简单介绍了东乡族及其语言。

村松一弥:《中国少数民族》, 每日新闻社, 1973 年, 82-83 页。

岩佐昌璋:《中国少数民族和语言》(中国语言研究学习双书 5), 光生馆, 1983, 80-81 页, 202-204 页。

4. 东乡语属于蒙古语族, 但是与我们过去所熟悉的蒙古语族诸语言比较起来有明显的不同。即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喀尔喀蒙古语、苏联的布利亚特语和卡尔梅克语, 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蒙古语等蒙古语族诸语言之间, 其词汇、语法形态上的对应关系是一目了然的。可是东乡语与上述这些语言一起比较时, 其对应关系就不一定那么清楚。

这是因为, 一是东乡语词汇大半被汉语借词所代替的缘故; 另一是由于东乡语在历史发展中获得独特的语音体系, 被该语言所继承下来的蒙古语族的词汇和语法形态在外形上颇不同于蒙古语族的其它语言的缘故。下面概括地观察一下东乡语语音上的显著特点。

首先, 元音没有长短音的对应, 元音体系由 $i \text{ } \text{ə} \text{ } a \text{ } o \text{ } u \text{ } \text{ɯ} \text{ } \text{ɤ}$ 等七个短元音组成。其中, ə 是央元音; ɯ 是非圆唇的、窄的、后元音; ɤ 是卷舌元音, 专用于汉语借词。

重音一般落在词末音节的元音上, 不过也有例外的情况, 即少数词的重音落在第一个音节的元音上, 这多见于借词。

尤其作为阿尔泰语系语言特征的元音和谐在东乡语里已经不存在了。与此有关联的就是不存在为适应于词干的元音而改变其词缀元音的现象, 在词缀当中几乎没有变体形式。

辅音由 $p \text{ } t \text{ } k \text{ } q; b \text{ } d \text{ } g \text{ } \text{ɣ}; f \text{ } s \text{ } x \text{ } h; w \text{ } j \text{ } \text{ɥ}; l \text{ } r; m \text{ } n \text{ } \text{ŋ}; \text{c} \text{ } \text{t} \text{ } \text{ɕ}; \text{ʃ} \text{ } \text{t} \text{ } \text{ʃ} \text{ } \text{d} \text{ } \text{z}; (\text{z} \text{ } \text{t} \text{ } \text{ɕ})$ 组成。在括弧里的是表示借词辅音。这些是按照国际音标标记的, 但要注意, $p \text{ } t \text{ } k \text{ } q \text{ } \text{c} \text{ } \text{t} \text{ } \text{ʃ} \text{ } (\text{t} \text{ } \text{ɕ})$ 是无声送气音, $b \text{ } d \text{ } g \text{ } \text{ɣ} \text{ } \text{ɕ} \text{ } \text{d} \text{ } \text{z} \text{ } (\text{ɕ})$ 是属于无声不送气音的系列。齿龈上颚(舌叶)音 $\text{c} \text{ } \text{t} \text{ } \text{ɕ}$ 和日语的“シ・チ・ジ”辅音近似。 $\text{ʃ} \text{ } \text{t} \text{ } \text{ʃ} \text{ } \text{d} \text{ } \text{z}$ 是卷舌音。

东乡语的音节结构极为单纯化, 这和蒙古语族的其他语言有显著的差异。就是说, 在东乡语闭音音节里只有以辅音 n 和 ŋ 结尾的形式, 其余都是以元音结尾的开音节。

上边所提的鲍培著作《阿尔泰语言学引论》(Introduction to Altaic Linguistics) 的第 7-8 页里提出, 区分东乡语和其他蒙古语族诸语言的特征“在于末尾的 r 和 g 的消失”这样的看法, 但很难说这个定义是确切的。因为, 实际上东乡语里出 n 和 ŋ 以外的音节末辅音(与蒙古书面语 $b \text{ } d \text{ } g \text{ } \text{ɣ} \text{ } m \text{ } s \text{ } r \text{ } l$ 相对应的辅音)全部消失或变化为 n 和 ŋ , 或者在辅音后面加上元音, 从而脱离了音节末的位置; 鲍培所说的“末尾 r 和 g 的消失”仅仅是这个现象的一个侧面而已。

例如:

蒙古书面语形		东乡语形
jöb	“正确”	dzɔ
ödken	“浓”	otɕiβaŋ
ög-	“与, 给”	ogi-
čay	“时间”	tʂa
sam	“梳子”	saŋ
ös-	“生长”	osi-
kür-	“到达”	kuru-
yal	“火”	qaŋ

应该指出, 这些是东乡语中的更新方面的特征; 但他有下述保守方面的特征: 很多的现代语言里已经完全消失了的词首无声摩擦辅音(中世纪蒙古语的 **h**) 在东乡语里仍被继承为 **f x h c** 等辅音; 较好地保留着名词词干末尾的不定 **n** 和词尾短元音等。

5. 《东乡语词汇》在内的《蒙古语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是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 19 名研究人员和研究生从 1980 年 6 月至 10 月在中国国内各地以蒙古语族诸语言和方言为对象进行实地调查而来的研究资料丛书。这次的语言调查是以达斡尔语、东部裕固语、东乡语、土族语、保安语和巴尔虎布利亚特方言、卫拉特方言等 7 个语言和方言作为调查对象的。《丛书》里预定收进这些语言和方言的《调查报告》(包括语音、语法)、《词汇集》、《话语材料》等各三种研究资料。

这个丛书涉及这些语言和方言的语音、语法、词汇等各个方面。不仅在数量上是相当丰富的资料, 而且在质量上也是由受过专门训练的语言研究人员按照统一的调查大纲和方法在现场同资料提供者一起渡过数个月的共同生活的过程中记录、整理出来的。所以, 在语言学上是极为可靠的记述资料。

同时, 从蒙古语族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的观点来看, 应该说它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研究资料。因为, 特别是对于达斡尔语、东部裕固语、东乡语、土族语、保安语等在蒙古语族诸语言中占据所谓“孤立”位置的语言来说, 它为语音、语法、词汇各个方面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初次铺平了道路。这些语言与蒙古语族的其他各语言和方言比较, 有着相差较大的特征。所以这些语言在蒙古语族中处在“孤立”语言的地位。但是, 过去对这些语言的比较研究, 由于资料的限制, 仅仅停留在指出一些明显的语言特征的“介绍”, 或者若干条词语的比较上, 而系统性的比较研究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在这一点上只有史密特、田清波两位所研究的土族语例外)。

处于“孤立”地位的这些语言之所以具有一系列语言特征, 一方面是由于这些语言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与其它语言不同的变化和更新的结果; 另一方面是由于这些语言独自继承和保留着其它语言里已经消失了的、古老的语言特征

的结果。因此，这些“孤立”的各语言资料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将以新的光辉照射蒙古语言历史和比较研究的可能性。总而言之，以《蒙古语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的公开发行，使包括中国国内孤立的蒙古语族诸语言在内的蒙古语族语言的研究，进入了可以进行真正的历史比较研究的新阶段。作为蒙古语言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业绩，向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的有关人员表示敬意。

1986年10月1日

（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 栗林 均）

（吉仁尼格 译 博克 校）